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邓加荣 著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
南 汉 宸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

南 汉 宸

○ 邓加荣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哲强

装帧设计：谢 欣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程建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 (Kaiguo Diyiren Yanghang Hangzhang)/
邓加荣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11

(中国经济学家列传)

ISBN 7 - 5049 - 3845 - 9

I. 开… II. 邓… III. 南汉宸—传记 IV. K825.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911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25.5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邓加荣，吉林省靖宇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报告文学集：《君子兰之谜》、《死里逃生记》、《台风眼里漏下的小船》、《童话里的冬天》，传记文学：《马寅初》、《孙冶方传》、《南汉宸传》、《林巧稚传》、《六小龄童的艺术与爱情》、《经济学家传奇》，长篇历史小说：《刘罗锅断案故事》、《海瑞》，散文集：《古诗意境追踪》，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南汉宸》、《淡黄色石榴花》、《龙泉行》，曾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作品奖。

序 言

骆耕漠

中国金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中国经济学家列传》，记录、缅怀和歌颂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并以此丛书奉献给热衷于国家经济建设，投身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大读者。出版社约我为此撰写一序言，不胜荣幸而恐力所不及。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发展的向导和指南。同时，政治经济学又是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宏伟大业的不可或缺的一门重要学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起，中国的革命就造就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气势磅礴。今天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我们党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以及有效调整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枢纽部位和前沿阵地。在经济建设实践中，造就和推出了一批灿若群星的著名经济学家，诸如马寅初、孙冶方、南汉宸、许涤新、徐雪

寒、薛暮桥等，还有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一批新秀，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他们立传，不仅于历史和现实，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完全可以从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人品学问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他们所具备的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认真钻研的进取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实践意志，皆可作为做学问人的楷模，这些经济学家的事业人生就是一部部生动的教科书。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使我感慨万千。

出版社约我为这套丛书作序，也使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虽与马寅初、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家是同辈人，也是同时代人，并与他们有过密切交往与工作往来，他们中有的和我一起走进经济科学这座殿堂，共同从事过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为此，我们曾不懈努力，有那么一点“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感慨，可以说我们共同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努力和贡献，也共同取得过喜人的成绩。但我与这些学识精到、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写此序言也甚感汗颜。但细想一下，现在那些亲眼目睹昨日艰辛和辉煌的人，健在者已经不多，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说上几句要说的话，作为丛书的提示和补白。我愿意参与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我也是一种鼓舞和勉励。

据悉这套丛书还将陆续推出经济学界的一代新人，这正是我早已期盼并衷心祝愿的。我确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象征着一个伟大经济变革时代的开启和进

步，这正是我们时代进步和事业发展，以及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因为，改革开放已将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了。

2005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序篇	—— 经济学的命运	—— 1
一	—— 毛泽东搬救兵	—— 13
二	—— 鲁忠才长征记	—— 31
三	—— 会计科长躲账	—— 45
四	—— 延安新市场	—— 52
五	—— 两世的情谊	—— 62
六	—— 秘书长专政	—— 73
七	—— 劝说续范亭	—— 86
八	—— 动员阎锡山	—— 95
九	—— 战地动委会	—— 108
十	—— 只要能有一顶帽子	—— 121
十一	—— 抗战是取消不了的	—— 135
十二	—— 每人发一把锄头	—— 148
十三	—— 毡帽银须老者问	—— 166
十四	—— 毛主席来信	—— 182
十五	—— 妇女合作社的毛线衣	—— 194
十六	—— 别来革财政厅的命	—— 205
十七	—— 在长城内外	—— 218
十八	—— 风云万里邯郸路	—— 232

十九	董必武题字	245
二十	夹峪村里的筹备处	260
二十一	人民币诞生记	274
二十二	广纳贤士金融苑	283
二十三	银元风波和证券大楼	298
二十四	“三紧三松”战术活	311
二十五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323
二十六	香港金融工作团	335
二十七	罗工柳设计的钞票版面	346
二十八	西园寺公一送来的铁画	355
附	南汉宸年谱	366

序
篇

经济学的命运

吴晗在一篇文章中说,《资本论》译者之一王亚南同志有一天问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提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Wan Mao-in,不知该怎样翻译。吴晗问他,马克思是在什么问题上提及到这个人的?王亚南说,是在讲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时提及中国这位理财官的,说他在 1854 年(为清咸丰四年)曾向天子呈奏一份报告(实际上即奏折),报告中建议暗将官府发行的官票改成为可兑现的钞币,4 月份大臣们审议时不仅未予采纳,反而受到申斥,马克思甚至还担心,这位理财官“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①吴晗听后,立即去咸丰年间户部(主管国家财政部门)官员的名录中寻找,很快就查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的名字。王亚南就将“中国理财官”这段文字意译为“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②。

原来,中国这位很有头脑的理财官(可以说,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财政金融学家)王茂荫(1798—1865 年),出身于安徽歙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46-147 页,人民出版社,1975。

县的一个半官半商，具体一点来说，基本上以经商为主业的家庭里（只有曾祖王洪烈，中了武举，但因家务缠身也没出来做官，其祖与父都是以经商务农为主业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上进士后，他就一直在户部衙门里任职，直至迁升到户部右侍郎的高位。多年的理财实践，加上出身于一个徽商家庭，使他对于财政、金融颇有一些近代意识的高明见解。他总结了我国远自宋、元，近至清初发行官钞的历史，指出它们之所以屡兴屡废的原因共有十大弊端，例如，因是由官府强制推行，民间就不愿意接受，因而也就无法顺畅流通；由于没有一个发行限额，就经常变成为弥补朝廷亏空，无端榨取民间财物的一种手段；由于印制不精，容易产生破损和伪造等等。因此，他从咸丰皇帝一登基时（1851年）起，就连续几次地向皇帝上疏，历陈官钞之弊，主张依靠商家发行可兑现的钞币；同时要规定一个最高的发行限额，初步定为一千万两，相当于每年财政收支的四分之一，分期分批发行出去；人民可以随时向商家持钞兑现。他认为，钞币只有在“铜钱票能兑换到铜钱”、“银票能兑换到白银”时，人民才乐意接受，才便于在市场上顺畅流通。他更详细地规划出这种钞币的票面形式和印制要求。按他的规划，票面可分为十两与五十两两种，十两以下使用铜钱；十两以上使用银两。印制要求采用上等熟丝织品，这样，在流通中才不容易破损。领钞的银号须在钞票背面上加盖图章印记，以后每一次转手都由持用者在背面签字盖章，步步设防，借以防范假钞冒名顶替混进流通中来。钞票背面签字盖章已满时，可持钞票到官府制钞局去更换新币，旧的即刻截角作废。

他的这套纸币发行理论，应当说是很科学合理的，在中国当时完全没有受到西方现代经济学说影响的封闭环境里，他能够根据货币流通运转的客观规律，有学识、有见地地适时提出整理我国纸币的管理与发行，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许多观点的提出也都是完全符合于纸币流通客观规律的，这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当是很为闪光的一页，是一项很为难能可贵的信用货币学说。例如，他主张发行要有一定限额，滥发虽在名义上可以多取，而其结果由于造成物价上涨，多收的部分很快又为物价上涨所冲销，他非常明智地指出其中的辩证关系说：“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明际钞一贯至不值一钱。”他的这个见解，与马克思关于纸币流通规律的揭示是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司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司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8盎司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4盎司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①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财政金融学家却一直罕为人知，以至于像王亚南那样有学识的经济学家在翻译《资本论》时也不知道其人其事；可见，经济学，特别是财政金融学在我国历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47-148页，人民出版社，1975。

代科学文化宝库中是很不起眼的，不占什么地位的，很不受人重视的。这是因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囿于封建社会习俗所致，也是我国现代工商业经济不发展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我国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的影响所致。因为，居于我国文化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子罕言利”，所以《孟子》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向魏国国君梁惠王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思想的主导，致使我国的经济学术思想以及众多有创见、有思想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财政金融学家，都被淹没在历史的浩瀚烟尘之中。那位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理财家王茂荫，自然也就不能例外了。尽管他的那些颇有见识的理财观点一提出来就受到外国人的重视，他的奏章虽然未被朝廷重视和采纳，并被咸丰皇帝斥责“为商人指使，不关心于国是”，“传旨严行申飭”，恭亲王奕訢，定郡王载铨等王公大臣核议时 also 认为：“窒碍难行”，“应严旨切责，调离户部”；但是，它一提出，却即刻被俄国公使馆所发现，编译成中国学术思想的专门著作拿到俄国去出版（见《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彼得堡版）。马克思是从 1858 年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德文本上，发现这项颇有见识的学术观点的；可见，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事实上，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有创见有深刻内涵的经济学、财政金融学方面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是层出不穷、不为罕见的，其理论的深度、见识的超前、作用的深远，丝毫不比西方那些有着重大贡献的学者们诸如希腊的色诺芬、

亚里士多德和英国的威廉·配第、休谟、洛克等人逊色的。只是由于受着传统的文化道德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这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和像王茂荫这样卓越的关于纸币流通的经济主张，也终因未能得以贯彻施行而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另外也还有一些主张，虽然得以施行并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因为这些学术思想的创始人本身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他们在文治武功上的丰功伟绩太盛，把财政经济学术思想上的成就给冲淡了，以至于完全给埋没到无须提及的历史堆陈里。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是历历可数的，其卓识的财政经济思想，甚至一直在实践中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但却非常遗憾，人们却都偏偏忽视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就像周朝开国的明君贤相周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周公姬旦，都是一些很有卓识创见的理财家，在治理上都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绩，从而才使得地处西部边陲的西周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天下三分周已得其二，他们所提出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一直流传到今天仍不失之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在专门记录周初政治经济制度的《礼记·王制》中就有明文记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但人们所知道和想到的文王与周公，只是他们的作《周易》、定《周礼》、伐商和征讨管蔡之乱等的功绩，无人会提到有关财政收支原则上的这一项重要见解。

至于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管仲，其财经思想更是精深独到，他的盐铁专卖和依靠间接税来减轻人民直接交

纳的田亩税、人头税的主张，对于发展齐国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至于使得地处海滨的区区之齐，能够很快实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管仲所提出的理财主导思想：“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已为人们千古所传颂；但是，人们也只把管仲当作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来看待，而很少有人提及到他的理财思想。

就是一贯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在具体到财经治理上也提出不少卓有见识的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例如，在作为五经、四书之一的《大学》里，就深有见地地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在这里，它将生产与财政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得多么深刻：生产者的数量应当是尽量地多，单纯消费者的数量应当尽量地少；生产时应当加紧努力，使用时应当按时节用，这样，国家的财政能够不充裕吗？这与我们常说的增产节约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当选后首次答记者问时，便一字一句地引用了《大学》中的那段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在过去人们贴的对联中，就有这么一副，叫作“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文章半理财。”它所说的，就是《大学》中的这一段非常明智的话。遗憾的是，这些精辟独到的财政经济思想也被儒家浩繁的经史典籍给冲淡了，就是闪烁着卓越的理财思想光辉的那段文章，也因其通篇都是讲仁义道德的，就是在讲理财这段观点之前也要先贯之以仁义道德观念以作为指导思想，

着重强调“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在这之后才讲：“生财有大道”，他把理财之道只作为实现仁义道德主张的一个注脚，至多只能作为一项具体措施，因而读四书、五经的人只见仁义，而忽视其卓越的理财思想。后来虽然有人一再强调此一思想的重要性，但也只能是“半理财”而已，而那多一半都不在理财上。

其后，许多有卓越见识的理财家，诸如汉代之孔仅、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杨炎，乃至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叶适，明末的李贽等，虽然在理财的学术思想上和经济改革的实践上，都做出了一定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很卓越的贡献，例如汉武帝时的桑弘羊设立盐铁、均输、平准等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税收的增长，国力的增强，也调剂了物资的余缺，平稳了市场物价，为汉武帝征伐匈奴、稳定内部秩序和赈济灾民，提供了充实的经济保证。但是因为他们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一部分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又因为他们的革新立论和理财理想有悖于儒家的仁义道德的传统观念，便招惹了诸多方面的责难与攻击，甚至将其作为传统观念的叛逆而百般地加以非难和攻讦，使其学说成为谬种而难能得以流传。一部官修的《盐铁论》，就是排斥和黜除桑弘羊卓越理财思想的典型例子。其后，宋代对王安石青苗法的攻击，明代对李贽非儒的攻击，也都属于同一类性质的事，最后，甚至到了公开地给李贽戴上了一个“儒家叛徒”的帽子。你想，一个出自于儒家叛逆者之口的财政经济思想，即使如何的深邃精辟、独到致益，自然也就不可能得以广泛流传了。

只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思想传入到中

国之后，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理论之争，才使得社会学、经济学以至于财政金融学，都成为要改变中国衰朽腐败、贫困落后面貌的前沿学科，成为现实斗争中的一门重要学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众目所瞩的学科。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天生就是很贫瘠脆弱的，由于其经济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夹缝之中生长起来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发展它的学术思想与理论学说，因此近代的经济理论，以至于近代的财政金融学术思想的开发和传播，几乎是微乎其微，即使是有也近似于无，就像韩愈的诗中所述“草色遥看近却无”一般。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以至于近百余年来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的大思想启蒙家严复（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是由他梁启超、孙中山和严复三家来作为开启和引导者的），直到他去世时还不知道，或者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来表述“经济学”一词的中文译法。他曾反复地推敲，认为当时大家所用的国富、财富、食货、货殖、平准等词都不恰当，或者说都不准确，最后决定选用“计学”或“计生学”一词。其实，他这“计学”一词也不能涵盖“经济学”的科学概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791页，人民出版社，1964。